

· SCI 與學術評價筆談 ·

# 學術評價如何走出“SCI 至上”的怪圈

馬 敏

新冠肺炎疫情阻擊戰打響之後，痛定思痛，許多問題都正在引起全社會的反思。其中，如何破除“SCI 至上”，探索建立科學的學術評價體系，是教育界和學術界正熱議的話題之一。我個人認為，討論這一問題，切忌重蹈“一邊倒”、“一刀切”思維，而是要冷靜分析這一問題的成因，梳理其背後的根源，提出切實可行的治理之策，使學術評價能真正走出“SCI 至上”的怪圈。為此，提出三點不成熟的看法，請各位方家指正。

## 一、各歸其位：破除“SCI 迷思”

正如兩部委文件中所言，破除論文“SCI 至上”，並不是否定 SCI，更不是反對發表論文，而是要扭轉這一問題上的偏向，樹立正確的評價導向。為此，我們首先必須明確“SCI 迷思”的癥結何在？“SCI 至上”的怪圈究竟何以形成？

其實，憑心而論，作為一種科研工具，當初引進 SCI 並沒有什麼大錯。眾所周知，SCI 是美國創辦的一個科學引文索引，本質上是一個分類數據庫，就如同圖書館的分類卡片。類似的索引工具和引文數據庫，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還有同樣從美國引進的 SSCI（社會科學引文索引）和 A&HCI（藝術與人文引文索引），以及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開發研製的 CSSCI（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）。

SCI 等作為科研工具之所以影響廣泛，以致形成“迷思”，關鍵是它們擁有數字龐大的來源期刊和數字同樣龐大的文獻數據庫。截止到 2017 年，SCI 所收錄的期刊總數已超過萬餘種，覆蓋了國際上大多數具有重要影響的期刊；CSSCI 收錄的來源期刊共有 554 種、擴展版來源期刊 200 種、集刊 189 種，該數據庫積累了包括人文、社科所有學科約兩千萬篇文獻資料，是目前中國最大的人文社科引文數據庫。正因為如此，無論是 SCI 還是 CSSCI 均成為科學研究不可或缺的檢索工具和分析工具。學者可利用這些工具，輕鬆了解某一學術問題或觀點的起源、發展，跟蹤最新的學術前沿，為學術研究提供數據資料的支撐。同時，也可利用其數據對學者科研工作進行量化評價，從而具備了學術評價功能。可以說，在當初學術界缺乏客觀評價標準，人為因素太多，同行評議又尚不成熟之時，這套簡便易行的量化評價標準和辦法，還是起到了正面作用，對國內學術評價工作的嚴謹化、科學化具有積極意義。這點是不能輕易否定的。

但是，隨著時間的推移及行政權力的不當操作，SCI 的輔助性學術評價功能被無限放大，以致最終被推上神壇，走向了反面。近年來，SCI 論文數量、被引次數、高被引論文、影響因子相關指標，以及衍生出的 ESI 排名，已經作為學術評價、職稱評定、績效考核、人才評價、學科評估、資源配置、學校排名等方面的核心指標，成為某些學校辦學所追求的根本目標，導致其評價功能發生了嚴重的異化和扭曲。SCI 及類似指標的異化和扭曲，帶來的直接後果，便是學術生態的惡化，學

風浮躁和急功近利,不利於高等教育高質量、內涵式發展。

表現之一,片面追求 SCI 論文數量,以數量代替質量。一些科研人員花費大量時間刻意去國外發表 SCI、SSCI 論文,過度看重“高被引率”,完全變成爲寫論文而寫論文,根本不考慮研究成果的創新貢獻和實際價值,敗壞了學術風氣。有的研究者實際貢獻不大,卻可憑藉 SCI 論文數量輕鬆獲得“院士”頭銜,但像屠呦呦這樣獲諾貝爾獎的有真才實學之士,卻因爲缺少 SCI 論文,一再落選院士評選。甚至像袁隆平那樣世界聞名的“雜交水稻之父”,也可以因論文數量較少曾三度落選院士評選,直到第四次才成功入選工程院院士。這種片面追求 SCI 和 SSCI 論文數量的結果,不僅進一步加劇了學術生態的惡化,而且造成國內優秀的科研稿源大量盲目外流,降低了國內期刊的學術水平和國際競爭力,國家大量的物力、財力投入幫他人做了嫁衣裳,對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極爲不利。

表現之二,論文至上,尤其是 SCI 論文至上,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大量學術腐敗現象,製造了海量“學術垃圾”。據相關統計,我國被 SCI 收錄的論文總篇數,從 2000 年的 3.14 萬篇,猛增至 2009 年的 13.11 萬篇,至 2010 年,中國的 SCI 論文數已經排名世界第二位,僅次於美國。但論文的質量卻遠沒有數量增長得快,我國 2003 年引文數世界排位第 18 位,但篇均引文數卻排到 124 位。文科也同樣如此。據中國知網對 2,099 種社科期刊的統計,截止到 2018 年 4 月,2015 年可被引文獻量 543,018 篇,其中零被引文章總數 251,868 篇;2016 年發表、截止到 2018 年 4 月 25 日,下載低於 10 次的是 15,037 篇。也就是說,看似數量浩大的論文,其實沒有多少讀者。更不用說,其中還充斥相當數量剽竊、造假論文,或既無新材料,又無新方法,更提不出新觀點的大量“學術垃圾”(參見李伯重教授相關論文)。儘管近兩年這方面的情況有所改善,但我國平均每篇 SCI 論文被引次數與世界整體水平還是存在相當的差距,因弄虛作假論文被撤稿的現象也屢有發生。

上述情況說明,破除科研評價中“唯論文”及“SCI 至上”不良傾向,的確已成當務之急,是學術評價改革的突破口。而在我看來,破除“唯論文”和“SCI 至上”,關鍵是要在“唯”字上下功夫,在“至上”二字上做文章,要揭去罩在論文和 SCI(包括 SSCI、A&HCI)頭上神秘的面紗,還其“廬山真面目”,各歸其位,各盡其用,“上帝的歸上帝,凱撒的歸凱撒”,不要人爲地製造出一個無所不能、包打天下的“神器”。

在“各歸其位”意義上,論文無非是學術成果的載體,當然有其存在的必要,但其重要性在質量而不在數量,多未必就好,“唯”更不可行,真正有創見的好論文,一篇可以抵十篇,那種平庸、造假的“垃圾論文”,不僅毫無價值,越多反而越害人。SCI 在除卻神秘面紗後,仍然是一種有用的索引工具和引文數據庫,是學者展現學術研究成果、進行國際學術交流的平台和形式之一,當然也有其繼續存在的理由,不能隨意棄之不用(尤其是 SCI 頂尖期刊中的論文多數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科研論文)。CSSCI 在中文社科引文數據庫建設中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但我們必須認識到,將 SCI 論文相關指標直接應用於學術評價,是有很大局限性的。首先它們本質上是文獻索引系統,並非評價系統,不能把這類收錄論文簡單等同於高水平論文;其次,這些系統中引用次數反映的是論文受關注的情況,並不能完全對應創新水平和實質貢獻。因此,唯 SCI 是尊,誇大其評價功能,將其提升到“唯一”和“至上”的核心評價指標地位,則是完全錯誤的。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說,“SCI,不能沒,不能唯”。由此可見,“SCI 至上”最大的問題,就是將一種普通載體和工具推到了迷信的程度,賦予它本不具備的超級功能,以致產生了無窮無盡的“迷思”,形成了一種新的“工具拜物教”。在如此之多的教訓之後,讓 SCI 們走下神壇,回歸凡間,可謂正當其時。

## 二、正本清源：弘揚真正的學術精神

學術評價要走出“SCI 至上”的怪圈，又並非僅僅淡化 SCI 等指標的評價功能就可以奏效，還必須深究造成這一亂象的根源，正本清源，標本兼治，從源頭進行治理。從客觀言，顯然是我們的學術評價體系和導向出了問題。不得不承認，長期以來，受大幹快上、趕超世界一流的心理驅使，我國學術評價體系和導向不知不覺墮入了以數據為中心，以量化考核為主的量化評價體系怪圈。

首先是高度指標化。整個教育領域從上到下，從教學管理到科研管理都有一套量化的、剛性的指標體系。大學的師資隊伍、學科建設、科學研究、教學質量、社會服務都被外化、濃縮為一套由具體數字體現的指標體系，這套密不透風的指標體系不僅是考核大學辦學水平的依據，而且是學校資源分配的依據，學校辦得如何，能夠獲得多少資源，就要看各項指標達標情況如何。學校發展，變成了對標發展：研究指標體系，完成相應指標，贏得好的排序，辦學活力與主動性喪失殆盡。

其次是高度數字化。所有的指標最後都轉化成可以計算的量化指標，即一系列數目字：科研立項數、教學時數、論文篇數、成果獲獎數、學生就業率等。學術評價，實際淪為簡單的計數遊戲：有多少個國家級省部級重點學科、重點基地、重點實驗室，有多少個品牌專業、精品課程、高端論文、教學名師、國字頭專家。其中，科研指標和高端論文佔比又最高，“唯論文”成為“四唯”（唯論文、唯職稱、唯學歷、唯獎項）之首。

指標化、數字化背後是高度的行政化。這套量化學術評價體系實際上是由行政主導，而不是學術主導的，帶有強烈的行政化色彩。行政化的要害是官僚化、科層化、簡單化、一刀切，是利益驅動而非學術驅動。行政化管理和行政化導向，最大問題是不顧學術發展的自身規律，以管行政的辦法管學術，以管幹部的辦法管教師，以考核政績的辦法考核科研。正是在這種行政思維方式主導下，以 SCI 為代表的精準定量評價系統，才被相中並推上神壇，成為衡量學術水平的最高標尺。所以，糾“SCI 至上”之偏，首先要糾過度量化的學術評價體系之偏，糾學術管理中高度行政化導向之偏。

從主觀上言，形成諸亂象的根源，還有學術精神的整體性失落。這是更深層次的問題。

拜改革開放的春風之所賜，自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，中國學者和中國學術都迎來了自己的春天，開啓了中國學術的黃金時代，無論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均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，為科教興國作出了巨大貢獻。然而，隨著全民經商大潮的興起，拜金主義、功利主義也開始侵蝕學界，部分學者隨波逐流，拜倒在權力和金錢之下，要帽子、要票子、要名分，絲毫不加掩飾。在學術上則急功近利，學風浮躁，甚至不惜弄虛作假，抄襲剽竊，醜聞不斷，完全泯滅了學術的初心。坦率而言，這種學術價值的扭曲及學術精神的整體性失落，正是構成今天學術失範、論文至上、“SCI 至上”種種學術亂象的深層次原因，恰如章開沅先生所言：“學風是世風的反映，學風又應成為世風的先導。學風隨世風墮落，隨波逐流，乃至同流合污，這是最可怕的事情，如果不嫌誇大的話，那就是哀莫大於心死。”中國有句老話，“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？”說到底，矯治時下種種學風之偏，最根本的，還是要重新喚起已然失落的學術真精神，從源頭上淨化學術風氣，優化學術生態，否則，一切都無從談起。

什麼是學術的真精神？簡言之，就是探求新知、追求真理、一心向學、孜孜不倦的學術興趣和學者操守。可以概括為三種精神：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；唯學術而學術的純粹精神；拋卻功利的奉獻精神。對一個真正的學者而言，這些精神往往是無需言說，伴隨終身的，是由內而外自然展露的，是他們一生堅守的信條。真正的學問，應是基於興趣，廣泛佔有資料，靜下心來，長期不懈探索的結果，基本與金錢無關、與項目無關、與 SCI 無關。

其實,不假遠求,我國文化傳統中就有著非常神聖莊嚴、求真求實的學術真精神在。孔子一生提倡“執事敬”,既“韋編三絕”,又“述而不作”,便含有對學術文章的內在虔誠和莫大謙恭。中國歷代有抱負、有氣節的士人,也無不非常嚴肅認真地視自己為文化“托命之人”,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在《王靜安先生遺書序》中即云:“自昔大師巨子,其關係於民族盛衰、學術興廢者,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,為其托命之人,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,補前修所未逮。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,以示來者以軌則也。”

其次,這種學術的真精神又體現在淡泊名利、功到自然成的為學態度上。真正的學者,完全是從使命和興趣出發去做學問,並不會斤斤計較自己論文發表在什麼刊物上,有多高的引用率。他們也往往耐得住寂寞,不急於發表不成熟的成果,而寧肯慢工出細活,“十年磨一劍”。如業師章開沅先生便謙虛地認為,“我一輩子寫了這麼多文章,出了這麼多書,我自己客觀認為,能夠流傳下去的,可能就是一本《張謇傳稿》。”這本書他於1962年動手,1964年基本完稿,直到1986年才經修改後正式出版,整整花了24年!就此而言,誠心、靜心與敬業乃學者為人治學的根本,如果根本皆失,枝杈的修理又有何用?誠如明人薛瑄所言:“為學第一功夫,立心為本。心存則讀書窮理,躬行踐履,皆自此進。”(薛瑄:《論學》,《薛文清公讀書錄》卷五)

“立心為本”,重拾學術真精神,關鍵要做到兩個回歸:回歸學術初心,回歸學者本位。回歸學術初心,就是要回歸到學術研究的起點和原點:求真求實,探求科學真理。這種探求的結果,是要產生原創性的學術成果,真正做到“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”。回歸學者本位,則有兩層涵義:第一層涵義是教育機構的管理者要保持對學術的敬畏,以學為尊,按照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管理學術,真正落實“學者治學”;第二層涵義是學者自身要做到潔身自好,自覺抵制各種各樣的誘惑,始終保持學者的獨立人格,保持對學術內在的虔誠,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,而不是求名求利的工具。倘若以上皆能切實做到,真正的學術精神和良好學風定能得以弘揚,“SCI至上”的怪圈將不攻自破。

### 三、分類評價的必要性和方法

從源頭釐清“SCI至上”現象的根源,為推動學術評價體系改革奠定了基礎,但究竟如何在實踐中實施這方面的改革,提升學術治理能力和水平,仍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。綜合施策視野下的學術評價體系改革,需多管齊下,破立結合,邊破邊立。總體思路是要適當吸取現有量化評價體系中的合理因素,扭轉現行單一化、機械化的評價方式,朝著更加多元化、多樣化、靈活化的方向發展,構建權重比例更加合理平衡的綜合指標評價體系。具體講,可從以下方面發力:

一是找準“痛點”,精確破除量化評價體系的“病灶”。

量化學術評價體系的“痛點”,主要有二:首先是“過度量”,以收錄進SCI等的論文數量和引用率高低為唯一標準,忽略了其他標準;更要命的是,將論文數量與資源配置和獎勵直接掛鉤,一篇高影響因子論文,動輒可以獲得數萬或數十萬元的獎勵,助長了科研中的功利化傾向。因此,必須要把握好使用SCI等指標的“度”,大力降低數量指標要求和過高的獎勵,增加其它評價指標,進行綜合評價。其次是“過度泛化”,對所有教師一律使用這類指標考核,以論文數量論英雄,並滲透到職稱晉升、績效考核等方方面面。尤其不應該的是,這套考核辦法還被應用到研究生學業管理之中,每位研究生必須要在核心期刊發表1~2篇論文,才能畢業。這條規定,不知造成了多少學生、或學生與導師的共同學術腐敗。因此,破除量化評價體系之“病灶”,另一個重點是要壓縮量化評價指標使用的範圍,替廣大教師鬆綁,廢除研究生畢業必須要有核心期刊論文發表的陋規,讓研究

生專注於學業，一心一意寫好自己的畢業論文。

二是要定性與定量相結合，建立健全學術分類評價體系。

在學術評價中，完全沒有量化是很難做到的，完全不看論文也是不可能的，關鍵是要把量化評價與定性評價結合起來，將論文與其它成果形式（如著作、研究報告、諮詢報告等）結合起來，以質量為主，綜合評價。同時，更重要的，是要根據不同學科特點實施分類評價，且忌一刀切、一鍋燴。不同類型的科研工作，成果產出形式是不同的，評價標準自然也有所不同。基礎理科和人文學科可能論文的權重比例更重；工科和社會科學可能得更多看其實際應用和社會服務貢獻。就人文社會科學而論，經管法學科可能比較看中 SCI、SSCI 高端論文，文史哲等傳統人文學科則更看重國內發表，且多為個人長期獨立思考的產物，也有學者認為通常都是“閒暇的產物”，很難用數量指標來衡量，而更多地應是定性評價。由此可見，學術評價指標體系的分類宜細不宜粗，要分領域、分學科制訂不同標準；評價標準宜多元化、多樣化，而不宜標準化、單一化。一個值得借鑒的做法，是由各學科評議組（如政治學、中國語言文學、中國史等）集中本學科優秀專家，制訂本學科的學術評價指標，形成“業內”共識。

三是要完善同行評價和代表作評價制度。

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意義上評價學術水平，誰來評價，如何評價至關重要。因為標準畢竟是要靠人來掌握的。顯然，行之多年的“同行評議”制度仍然是最為可行的，中外學術界概莫能外。但同行評議關鍵是要解決好學術共同體的優化組合，解決專家遴選的權威性、公正性，同時還要強調其自律性，盡可能降低人情因素、師承因素、圈子因素以及行政權力的不合理干預。為此，必須加強同行評議的制度建設，包括：遴選制度、承諾制度、迴避制度、信譽制度、追責制度等。同行評議評什麼？當然是要評代表作。代表作既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論文，也可能是著作（如美國研究性大學主要看代表性著作）。重點要看論文或著作的創新性和內在品質。就此而言，從事同行評議的學術共同體要儘可能由相同或相近專業的學者組成，即所謂“小同行評審規則”，使評價具有可信度和權威性，不能由外行評內行。應當相信，只要假以時日，加強制度建設，國外學者能做到的不講情面、不循私利，只認學術水平的客觀評價，經過努力國內學者也同樣可以做到。

四是要多方配合，大力優化學術生態。

這裏所說的“多方”，包括教育管理部門、高校、學術期刊和學者自身。行政管理部門要主動去行政化，回歸服務角色，減少各種評估和排名，堅持分類和分領域評價，尊重專家和學術共同體的評審意見，不搞暗箱操作；高校在學術評價中要降低數量要求，不把 SCI 相關指標作為學科和科研人員評價的標籤，大力提倡潛心治學，打造精品、名作，讓治學環境回歸安靜和寬鬆；學術期刊要杜絕關係稿、人情稿，實施匿名評審制度，堅持發表高質量學術論文。“以刊評文”固然不對，但刊物層次畢竟有高低，能够在名刊、名欄（好的專欄）上發表文章，仍是學者們心嚮往之的事，可以而且應該為其學術聲譽加分；作為學術評價主體的學者，則要自尊、自立、自強，加強學術自律，自覺遵循學術共同體的“內在的價值尺度”，客觀公正，以學術的眼光、學術的標準來評價學術本身。

“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”只有做到多方配合，多點發力，合力營造良好的學術環境和學風，形成更為科學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及機制，學術評價才有可能最終走出“SCI 至上”的怪圈，使學術研究回歸健康發展的正道，再現勃勃生機與活力。

（作者係華中師範大學校學術委員會主任、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，教授）

[責任編輯 劉澤生]